

# 惟适之安

wéi shì zhī ān

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黄克武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惟适之安

黄克武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黄克武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

(近世中国)

ISBN 978 - 7 - 5097 - 3269 - 4

I. ①惟… II. ①黄… III. ①严复(1854~1921) - 人物研究  
IV. ①B2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436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著作权人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 近世中国 ·

**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著 者 / 黄克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赵 薇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责任校对 / 刘伟雷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1.6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208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269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1 - 6634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自序

近年来我的研究主要环绕着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4～1921）的生平与思想。这些研究虽然多限于“一人之事”，不过更重要的关怀则是希望“知人论世”，能从个人经历延伸，进一步地观察清末民初之际“文化动态之整体”<sup>①</sup>。1998年笔者出版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简体字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与2008年出版的英文专著《自由的意义：严复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起源》（*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是有关此一主题的初步研究成果。这两本分别诉诸中、英文读者的专著主要探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译介<sup>②</sup>，及其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上的意义。笔者认为，严复不但是一位介绍西方现代文明的翻译家，更是一位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建立中国自由主义体系的思想家。

在研究严复自由思想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一方面大量地引介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国家体制结合成的现代性方案，另一方面他的思

---

① 这一角度的思想史研究受余英时先生作品之启发，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第2～6页。

② 本书外国人名采台湾联经版译法。以下同——编者

想中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启蒙”面向，却很吊诡地掺杂了许多“反启蒙”的因子。严复较著名的“反动”事迹包括抽鸦片，纳妾，列名“筹安会”支持袁世凯之复辟，肯定“孔教会”、“宗圣会”的尊孔读经之举与撰文附和“上海灵学会”的鬼神观念与“灵魂不死”之说等。以往对于严复思想中“反启蒙”的一面有两类主要的诠释：或是认为严复早年进取，晚年转而为保守、倒退（如周振甫）；或是认为严复具有矛盾、冲突的“两面人”的特征（如史华慈）<sup>①</sup>。本书将批评这两种主流论述，而尝试以张灏教授所提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时代之概念为背景，提出一个新的观点<sup>②</sup>。笔者不否认严复思想因时代的影响有所变化；同时处于中西文化冲击、交会时代的严复，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下，具有一部分矛盾、两歧的性格，然本书的主旨在于彰显严复一生思想有其连续性，而且他的现代性方案与终极关怀之间具有内在凝聚性与一致性。他的保守的一面有相当的部分是从柏克（Edmund Burke, 1729 - 1797）、摩利（John Morley, 1838 - 1923）肯定传统的看法，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 - 1895）、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 - 1903）的“不可知论”，与欧战后反科学的时代气氛而来的，并非单纯的复古；而他的启蒙面，主要不是来自“一从夫新，如西人所为”的“西化”主张<sup>③</sup>，而是源于“会通中西”的文化理想。对他而言，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反传统思想、反宗教迷信的主张，与白话文运动等可谓是一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灾难。1919年严复的四子严璩去唐山工业学校读书，这时五四运动正在北京如火如荼地展开，严璩“捐钱五

①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7 [1936]。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64])。

②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37～60页；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

③ 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第680页。

元……并结团抵制日货”。严复对此“深为不悦”，他劝四子应专心课业，不要过问政治，“如此等事断断非十五六岁学生如吾儿所当问也”<sup>①</sup>。他写了一首诗来劝诫他，也将此诗送给忘年好友熊育钊（纯如，1868~1942）<sup>②</sup>：

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慎勿三年学，归来便名母。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不胜舐犊情，为儿进苦口。

如上所述，严复的看法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生灵涂炭的悲惨经验有关。他在同一首诗中表示：“何期科学精，转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战，兹事那可又。”<sup>③</sup> 简单地说，他和1920年代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些学者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类似，一方面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导致毁灭性的战争；另一方面则引起对自身文化的信心，希望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之中寻找出路。他批判西方科学畸形发展、爱国主义与种族之争所导致的残酷战争，企望回归中国传统，因而形成了一个与五四反传统运动截然不同的思路。

由此可见，严复的思想与五四运动所揭橥的理想格格不入。如果把五四当作唯一的“启蒙”，那么严复自然就成为“反启蒙”了。不过如果我们接受高力克、许纪霖等人在研究杜亚泉（1873~1933）思想时所提出的观点，认为五四时代除了有胡适、陈独秀所提出的彻底改变的转化型的启蒙思想之外，还有一种以严复、梁启超、杜亚泉、章士钊、蔡元培等人所代表的温和渐进的调适型启

① 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第514页。

② 《严复集》，第410、694页。有关熊育钊的生平及他与严复的交往，尤其是他以严复教育理念为基础创办“心远中学”的过程，可参见薛隆基编著《熊育钊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南昌教育》增刊，1991。

③ 严复：《愈壘堂诗集》卷下，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35页上。

蒙传统。这正是许纪霖在反省五四启蒙运动时所提出的“另一种启蒙，一种温和的、中庸的启蒙”<sup>①</sup>。从此角度观察，严复的思想可谓五四时期调适型启蒙的重要源头，值得我们详加分疏。换言之，严复与五四思想家之差异不是“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而是中国现代性内部自由与保守之争、反传统与肯定传统之辨，而其源头之一是五四思想家的民主观主要源于西方的卢骚主义（Rousseauism），严复思想则源于弥尔主义（Millsianism）和柏克式的保守主义；五四思想家的科学观具有科学主义、反宗教玄学之倾向，严复则从“不可知论”出发，认为所谓的“科学”有其限度，而宗教有其价值。

这一本书的主标题“惟适之安”是采自严复自题的墓前铭刻，或许可以视为严复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代表他对后代子孙的谆谆告诫。本书主体部分计有四章，分别按照时代先后，从四个侧面切入，来讨论严复生活与思想之中所映照出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曲折历程。首先是“异性情缘”，描写严复家庭生活、情感世界与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其次是“北洋当差”，叙述严复从英国返国之后在李鸿章所主导的“淮系集团”内的仕途发展；同时讨论他从以建设海军、为国“立功”的发展方向，转移到以翻译来“立言”的重要人生转折。再次是“新语战争”，将焦点放在严复翻译工作对中国近代新语汇、新思想的影响，以及其间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对抗“东学”与“东语”的传播。最后一章则讨论“灵学济世”，剖析严复科学思想的底蕴以及他为何支持被五四新知识分子视为封建迷信的上海灵学会。

本书的第二章曾发表于笔者所主编的《第三届汉学会议论文集：思想、政权与社会力量》（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① 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许纪霖：《杜亚泉与多元的五四启蒙》，《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496～497页。

2002)。第三、四、五章则分别发表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9(2005)、55(2007)、62(2008)等期之上,各文在发表之前都曾在近史所的学术研讨会之中报告,又承蒙匿名审查人的仔细校阅,得以匡正缺失,谨致谢忱。不过这些文章发表之时均为单篇论文的形式,此次将各文统整成专书的过程之中,我作了比较大幅度的改写。一部分是增补了一些新的史料,使我们对严复生平与思想有更精确的认识。特别重要的是我征引了许多《愈壑堂诗集》的诗作,2003年孙应祥、皮后锋所编辑出版的《严复年谱》与《严复集补编》,2005~2006年严孝潜、严名等严家后人在天津《今晚报》所发表的20余篇严复未刊书信,以及2008年所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等。第二个部分则是修改各章的前言、小结,再加写了自序、第一章导论与第六章结论,使全书的理路更为顺畅,论旨亦更为清晰。结论部分的主要观点是我参加近史所2007年6月“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学术研讨会,担任“都市精英的宗教生活”分组评论人的发言内容,又在2007年9月在上海华东师大以“现代性与终极追寻:精英分子与民初上海的宗教”为题发表的演讲内容扩充而来<sup>①</sup>。

这一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中研院所提供的卓越的研究环境,让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斗室之中尽情发挥。再者,从1997年我在好友张力兄的引介之下,首度参加了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的“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此后的十余年间,我多次造访福州,参加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与福建师范大学所主办的学术会议,与福州学界结下不解之缘。在这些会议中我不但得以和世界各地严复研究的专家切磋问学,同时也因此得到许多严复研究的重要信息,这些史料奠定了本书的基础。其中特别要感谢的人包括严复学术研究会郑重老会长、已故福建师大严复研究所的林庆元教

① 该书已出版论文集,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页。



授，还有福州的林平汉、杨泗德、陈端坤、翁训彩、王民、卢美松、严以振，厦门的罗耀九，南京的孙应祥、俞政、皮后锋，北京的刘桂生、蔡乐苏、王宪明、戚学民、马勇，天津的严孝潜，武汉的苏中立，香港的林启彦、李金强等位先生。这几位先生对严复研究的推广付出很感人的心力。在福州时，我几乎踏遍了所有严复曾驻足之地，包括他的出生地苍霞洲、阳崎祖宅、马尾船政学堂、郎官巷故居、避暑圣地鼓山、尚书祖庙、鳌头山麓的墓园等。亲历其地让我对严复与他所处的环境产生了一份更深的历史感，也让我想起严复的一段话：“有出格见地，方有千品格，有千品格，方有超方学问，有超方学问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sup>①</sup> 多次的福州之行使我逐渐地拨开云雾，走进严复生命之底层。

最后，还要感谢两位书稿的匿名审查人，以及我的老师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墨子刻教授带我走进学术研究的大门，他的专著《摆脱困境》（*Escape from Predicament*）、《太平洋风云》（*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等书不但深入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肌理、彰显思想连续性，也开启了一个结合哲学与思想史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对我的学术生涯有无穷的启发。谨以此书献给墨子刻先生。

黄克武

2010年7月7日于南港

---

① 叶明勋“录几道公嘉言”为2008年“严复与中国近代化”研讨会题词。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福州市严复研究会编《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卷首插图。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自 序                               | 001 |
| 第一章 导论                            | 001 |
| 第二章 异性情缘：性别关系与思想境界                | 020 |
| 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初次婚姻                  | 021 |
| 二 纳江莺娘为妾                          | 027 |
| 三 续弦朱明丽                           | 030 |
| 四 与莺娘离异                           | 033 |
| 五 严复的烟霞癖                          | 036 |
| 六 忘年之交吕碧城与何纫兰                     | 042 |
| 七 小结                              | 052 |
| 第三章 北洋当差：从水师学堂走向翻译之路              | 056 |
| 一 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 057 |
| 二 严侯本武人，科举偶所慕：严复与科举制度             | 066 |
| 三 假令早遭十年，岂止如此？吕增祥、吴汝纶与<br>严译《天演论》 | 079 |
| 四 小结：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              | 090 |

|                                |     |
|--------------------------------|-----|
| <b>第四章 新语战争：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b> | 093 |
| 一 另一场战争                        | 094 |
| 二 从“名词”谈起                      | 097 |
| 三 严复对抗东学与东语                    | 107 |
| 四 严复与译名统一工作                    | 126 |
| 五 小结                           | 131 |
| <b>第五章 灵学济世：上海灵学会与严复</b>       | 134 |
| 一 从一页报纸广告说起                    | 135 |
| 二 民初灵学研究的渊源                    | 141 |
| 三 上海灵学会的成立                     | 150 |
| 四 上海灵学会的运作：扶乩与灵魂照相             | 154 |
| 五 严复的知识观                       | 163 |
| <b>第六章 结论：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b>      | 170 |
| <b>征引书目</b>                    | 185 |
| <b>索 引</b>                     | 207 |

# 第一章

## 导 论

严复（1854～1921）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1854年1月8日诞生于福建侯官。从他出生至今日的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中国经历了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在此过程中，严复的重要性主要不在政治场域或他所长期从事的海军教育，而在于他对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思想启蒙与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严复亲身经历了中国士人在身份与思想上的双重变革。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而培育出来的新“知识分子”，而他所引介、提倡的新观念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夏曾佑（1863～1924）在1896年于天津结识严复，并在阅读他的《天演论》稿本之后，立刻发现严复对西学的认识是晚明徐光启（1562～1633）、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以来的一次高峰。他说：

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来，始明算术；咸同之际，乃言格致。洎乎近岁，政术始萌，而彼中积学之人，孤识宏褰，心通来物，盖吾人自言西学以来所从不及此者也。<sup>①</sup>

---

① 夏曾佑：《夏曾佑致汪康年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25页。严复对夏曾佑的评价很高，1910年他曾致书载泽（1876～1929）推荐夏为宪法起草人员，严复说“安徽候补知府夏曾佑，天资敏锐，达识通时，博稽载籍，能言数千年治乱盛衰之故”。见《严复集》，第596页。

这确非过誉之词。

不过严复身上的“现代性”与“传统性”或说“启蒙”与“反启蒙”交织并陈，表现出“转型时代”的特征。严复肯定传统“五伦”的社会秩序与群体的价值，他在遗嘱中曾告诫子孙“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sup>①</sup>，在子女婚姻问题上，他主张“主观包办”、媒妁之言，反对“文明新法”中的自由恋爱<sup>②</sup>。

他强调学习英文，并以此认识西方新知，却不排斥古典汉语，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战国与隋唐时已达全盛，是进化的高峰。他说古典汉语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与优美的词汇，“其名辞富有，着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而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提倡的白话文则是历史的倒退。对他而言，白话文中“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瓠，正无如退化何耳”<sup>③</sup>。他对西学有所认识，曾明快地指出：“西治”扼要而说，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sup>④</sup>，这些观点都是切中要害的深刻观察，并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严复对于传统学问也有深刻的认识，并认为传统之中可以找到永恒的智慧。总之，五四以来思想界的所谓的“两歧性”，以及相应而来一些“诡譎歧异”的发展<sup>⑤</sup>，几乎都可以在严复思想中找到肇端。诚如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 - 1999）教授所说，“严复的关怀……是有意义的关怀，他因应这些关怀所做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努力”<sup>⑥</sup>。

① 《严复集》，第360页。

② 《严复集》，第689页。

③ 《严复集》，第699页。康瓠指空葫芦之意。《史记》卷84《屈原贾生列传》：“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瓠与瓠意义相同。

④ 《严复集》，第2、11页。

⑤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时代的探索》，第105～140页。

⑥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p. 4.

上述“转型时代”的观念最早由张灏所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意指1895~1925年前后的30余年间，中国受到传统与西力的双重冲击，产生了“民族救亡的危机意识”与思想解扭后“基本价值取向的动摇”。这一期间，随着新教育机构的建立、大众传播媒体的出现，以及新组织结社与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西方新观念对中国社会造成更深刻的冲击。转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新式学校与新兴传播媒体之中，使用新的词汇与新的文体所构成的新语言，来讨论一些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如中西文化之关系、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形式、民主与自由的意义、革命与改革的途径、新时代的人格典型等，因而促成新思想论域的出现。然而新词汇、新语言所形成的新论域虽然打着“新”的旗帜，却是在一个“传统思想与‘西学’交互影响的脉络”中迂回反复，逐步地推陈而出新。在此过程中，源于传统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影响到国人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诠释，因而展现出中西之间一部分冲突和误会，一部分交融互释的思想状态。换言之，转型时代的观念不但意指一些新观念的萌生、新理想的追寻，更指涉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转型时期，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潮的理想主义混合为一；儒家的经世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传统中应然与实然相结合的思维模式，则影响到人们对西方演进史观的认识<sup>①</sup>。面对此一冲击，人们应如何因应呢？诚如史华慈所述，严复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深具意义。

严复一生几乎都在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中度过，他的生活与思想均表现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交织而成的转型特点。在自强运动（或称洋务运动）时期，他因为家道中落，无缘透过科举考试晋身士绅阶层，转而接受福州船政学堂的海军训练；在英国皇家海军学

<sup>①</sup>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第59~60页；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院留学时又亲炙西洋文化，开拓世界眼光。返国之后，严复因不受重用，兴起了参与科举考试的念头，却屡次在科举中受挫。他又目睹甲午海战的失败，开始发愤翻译西书，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还模仿《泰晤士报》，发行《国闻报》、《国闻汇编》，宣传革新理念，而成为一代的翻译宗师与思想大家。

严复基于救亡意识所翻译的西书，并非乱无章法或单纯因应市场需求，它们包括当时最为人瞩目的四个领域：逻辑推理的科学观念、自由民主的政治思想、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以及以进化理论为中心的社会学说，而四者紧密相关，构成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尤其饶富意义的是：他的翻译并不是简单复述，而是配合译注与大量个人的作品，以一种源于本土的批判意识，对西学加以取舍、发挥。他熟稔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并尝试将西方文化的优点与中国固有的智慧结合在一起，以调适的方法，建立富强、自由与文明的新中国。这样的理论超越了清末以来“中体西用”、“西学源于中国说”、“全盘西化”等中西文化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此一构想直到今日仍具有时代意义。

有关严复对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的看法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sup>①</sup>。严复反对张之洞所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或“主中学而以西学辅所不足”、“仿其末节”等观点<sup>②</sup>。严复也反对“政本艺末”的说法，认为西方的技艺与西方的政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互相辅佐，并非一本一末，是以对于西方文化“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sup>③</sup>。由此可见严复虽然也用体用、本末等与宋明理学密切相关的语汇，但他根本上却反对将体用、主辅、本末等概念，应用到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交流时所应实行的策略。严复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有机性，他

① 黄克武：《严复的终极追寻：自由主义与文化交融》，收入刘青峰、岑国良编《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第201～218页。

② 严复译《社会通论》（1904），商务印书馆，1930，第126页。

③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严复集》，第565页。

以生物体来作比喻，指出“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肢；有其质干根荄，而后有其枝叶华实”<sup>①</sup>。换言之，无论中西，其精神、制度与物质方面的状况都相互配合，不可任意割裂。

上述的观点影响到严复对于文化间相互采借的态度。他反对不顾东西文化的内在差异，而作无根的移植。他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sup>②</sup>，因此一个不适当的文化采借不仅对本身无益，反而有害。这样一来，严复关于文化修改问题的看法不容易偏到五四时期的学者所提倡的全盘西化论。他不但在晚年反传统浪潮之中，提倡尊孔、读经，即使在早年积极提倡西方文化之时，他也不曾主张要完全放弃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政教仍有其是处<sup>③</sup>。

严复对“西学源于中国说”的批判亦不遗余力。雷中行对严译赫胥黎《天演论》的研究即指出严复翻译此书的原因之一，就是借此说明西学本身独特的历史发展、批判西学中源论，以纠正官绅士子对西方的浅薄认识<sup>④</sup>。

严复对西学中源论的反应最早可以追溯到他赴英国留学期间的经验。1878年3月12日，在英国留学的严复与当时担任驻英公使的郭嵩焘讨论到张自牧（力臣，1833~1886）的《瀛海论》<sup>⑤</sup>。张自牧是郭的好友，郭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两人讨论时事、洋务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郭称赞他“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1879年5月9日日记）<sup>⑥</sup>，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匪浅，且在积极认识西学上具有共识。在郭出使

①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严复集》，第559~60页。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所用的是“政教学术”，而非后来很流行的“文化”的概念。

②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严复集》，第560页。

③ 《严复集》，第49页。

④ 雷中行：《明清的西学中源论争议》，台北，兰台出版社，2009。

⑤ 《郭嵩焘日记》卷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444~445页。

⑥ 《郭嵩焘日记》卷3，第855页。



之前，曾保举当时为“布政使銜贵州候补道”的张自牧作为二等参赞官，后张因故未能成行<sup>①</sup>。

严复在与郭嵩焘讨论时很直率地批评了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例如张自牧认为，基督教其实是源于墨子的想法，加上印度、阿拉伯的观点。他在《瀛海论（中篇）》中说：“耶稣天主之教……盖墨氏之本旨，而缘饰以桑门天方之说，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兼天下而爱之，撒遂万物以利之，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而一以朋友之道处之，博施尚同，而昧于本末亲疏之道。”<sup>②</sup>张自牧并表示“天主”二字源于中国。郭嵩焘记载了严复对他的质疑：

其辟力臣论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以为力臣之言：“天主二字，流传实始东土”，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 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sup>③</sup>

严复也知道郭、张为好友，并认识到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说法具有积极开拓西学的意义，张自牧借此指出不应排斥西学，且儒者应以不知西学为耻；不过严复也看到张自牧思想中与旧有观念的妥协面，他批评张自牧对铁路、机器的保守态度，以及对海防工作的忽略。由此可见严复对西学中源论，或借此论来接引西学的做法，早有质疑，而后来他在《〈天演论〉自序》（“富文本”）中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

① 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广百宋斋校印，1891，“遵旨议奏疏附各片总署王大臣”，第5~1页；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东大图书公司，1993，第221页。

② 张自牧：《瀛海论（中篇）》，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20《洋务二洋务通论中》，第16页。

③ 《郭嵩焘日记》，第444~445页。